

分析与探讨

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生存适应分析

高伟浓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华人移民;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生存适应

[摘要] 澳大利亚、新西兰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面向亚洲的政策以来, 来自亚太地区不同国家的华人移民以及其他亚裔移民大量移进这两个国家。他们在异国他乡面临着以高失业率为主要特征的生存危机。但这一包括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华人群体, 克服重重困难, 站稳脚跟, 逐步积累, 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中图分类号] D634.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3)02-0044-08

An Analysis on the Adaptation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GAO Wei-nong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immigrants; Australia; New Zealand; living and adaptation

Abstract: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moved in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from different Asian-Pacific countries and other Asian immigrants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implemented the policies towards Asia in the 1970-80s. The immigrants have to face living cris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unemployment ratio. Somewhat different, the Chinese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have overcome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and quickly adapted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They settled down in the two countries, accumulated little by little and achieved the initial success.

一 地区来源多元化与亚洲化趋势中的华人移民

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在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移民政策一直影响到 20 世纪下半期。例如, 在新西兰, 直到 1974 年, 凡其祖先为欧洲籍的欧共体公民和爱尔兰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西兰居住。直到 1987 年, 当局正式颁布了“非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没有种族色彩的居住政策才最终形成。而在此之前, 来自所谓“传统移民来源国”的工人可以优先填补“职业优先目录”上的职位。如雇主要在那些所谓非传统移民来源国招募工人, 他必须证明, 这些工人既无法在新西兰招到, 也无法在传统移民来源国招到, 而且, 其技术不是工人的来源国所需求的。

[收稿日期] 2003-03-11

[作者简介] 高伟浓 (1953-), 男, 广东恩平人,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华侨华人研究。

新西兰的传统移民来源国包括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另外还有意大利和美国。这些国家以前曾对新西兰有过大量移民，或有类似于新西兰的假期培训计划。有人认为，这实质上是一项“白新政策”。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这项政策终于裂开了一个大口子，表现在传统移民来源国的名单范围扩大了，把那些有可能向新大规模移民的太平洋岛国也包括了进去。1976 年，当局大赦了先前来到新西兰并取得暂时工作准证的“既成事实”移民，并给予其永久居民身份。太平洋岛国移民即包括在其中。这样，整个 80 年代，太平洋岛国移民在新西兰一直占据重要地位。^[1]

1986 年，新西兰的移民政策又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面向亚太。究其源由，乃因为这时期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全球许多地区经济低迷的环境中形成了一个亮点，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目光。于是，新西兰的移民政策便随之发生转向，开始大量吸收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以增加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吸引投资，提升多元文化。结果，新西兰政府于 1987 年制订了新的《移民法案》，正式废除了“传统移民来源国”优惠名单范围。不过，对传统来源国的职业优先目录还是保留到 1991 年才最终废止。^[2]

澳大利亚在正式放弃其“白澳”政策方面走得比新西兰快。废止这一政策的过程持续了约 25 年，1966 年，移民部长奥波曼 (Opperman) 对非欧移民政策进行检讨后，正式宣布，未来移民申请的首要条件将是高素质的人，如，他们能适应当地居民，有能力融入当地，他们的现有资格适合澳大利亚。^[3]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一批取得“暂时”居民身份而要求居留澳大利亚的“非欧洲人”可以在 5 年后成为澳大利亚居民或公民。如按旧的规定，非欧洲人要等待 15 年，而欧洲人则只等待 5 年。^[4]这样一来，非欧洲人与欧洲人在成为居民或公民的待遇面前便平等起来。1973 年和 1978 年，政府又颁布新的政策，确认并巩固了非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从表一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上述政策的效果。据此表，1995 - 1996 年，澳、新外来移民中，英国、爱尔兰出生的人口构成了这两外国出生人口的主体。但相对而言，澳大利亚的英、爱人口比例小很多。它的外国出生人口主要是来自其他欧洲国家 (27.74%)，接近于英、爱的比例 (28.70%)。R. 温克尔曼认为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不同时间中，

荷兰、德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是澳大利亚的重要人口来源国。但在新西兰，50 年代，除英国外欧洲移民来源国只有荷兰一国。^[5]但是，到 1995 年，澳大利亚来自中东、北非以及南美、中美所占的人口比例比新西兰大得多。而新西兰的移民则主要来自大洋洲，也就是说，主要来自太平洋岛国。而来自亚洲的移民比例，两国则差不了多少。总的来说，新西兰吸纳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和荷兰，而澳大利亚的外来移民则来自许多国家。

澳大利亚的亚裔移民主要来自中国、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帝汶等国。近几十年来，亚裔移民占澳大利亚移民总数的比例不断提高。60 年代初，只有 2%，70 年代初上升到 6%，1975 年再增加到 16%。亚裔所以出现如此迅猛的增长，首先得益于 1972 年当选的惠特拉姆明智地废除了“白澳政策”，其次还因为印支难民特别是越南难民的大量涌入。实际上，1975 年的越

表一 1995—1996 年澳、新移民人口构成 (%)
(按地区统计)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大洋洲	9.24	26.30
英国、爱尔兰	28.70	38.62
欧洲其他地区	27.74	6.93
中东、北非	5.25	0.73
亚洲	21.92	21.81
北美	2.20	3.37
南美洲、中美洲	2.05	0.00
非洲	2.90	2.24
合计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数据据“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网上公布资料，以 1995 年 6 月 30 日为参考日期；新西兰数据据 Winkelmann, L. and R. Winkelmann, “Immigrants in the New Zealand Labor Market: A Study of their Labor Market Outcomes” (Wellington, New Zealand Department of Labor), Table A3, 其数据来自 1996 年的人口统计，但只计算工作年龄人口 (15 - 64 岁)。此表见 R. Winkelmann 上揭书，第 7 页。

南难民潮只是第一次。3年后，一次更大的难民潮再次袭击澳大利亚。这次难民潮一直延续至80年代初。第二次难民潮中直接从越南移居澳大利亚的华裔占了很大比例，如1981-1982年移澳越南难民中华裔就占了近1/3之多。^[6]他们与80年代后期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一道，形成了澳洲新华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一群体中还有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但后者跟来自中国大陆和越南的华裔不同。来自中国的华裔以留学生最引人注目（也有家庭团聚类型移民及少量投资移民）；来自越南的华裔以“难民”为基本特征。而来自香港、韩国等地的华裔则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是商业移民，占大多数；二是家庭团聚类移民，人数次于商业移民。此外，“白澳政策”废除后，移民澳大利亚的亚裔并不限于上列国家和地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如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等），在此不赘。

澳大利亚华人总体上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在6个华人（裔）移民群体（中国大陆、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东帝汶）中也有层次上的差别。据估计，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移民，其受教育程度介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生的华人（很大一部分是以专业和技术特长移澳者，也有留学后定居于澳者）与越南出生的华人（主要以难民身份入澳，有技术专长者为少数）之间；也可能低于印尼出生的华人，但肯定比柬埔寨、东帝汶出生的华人高。而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华裔中，大学毕业者分别为13%、16.4%、10%，这些数字均比澳大利亚全国平均水平（5.4%）高，也比其他族群（犹太人除外）出色。据1986年人口普查资料，6个华裔移民群体中，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大高于其他亚裔群体和全澳的水平。^[7]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信息来源较广，语言能力较好，适应国外生活的能力较强，因此也较容易迁移成功。但就经济、家庭团聚、人道主义三类移民来说，经济类移民受教育的程度总体上更高一些。而在经济类移民中，尤以技术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这一推论还可以从一些相关数字得到印证。据调查，有42%以上的移民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11%以上的移民具有专科文化程度，仅7.52%的移民具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8]当然，这些数字包括了中国大陆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暂时还找不到有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国移民的专门统计数字。但若以上述数字去一般地理解在澳、新的中国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应该是可行的。

中国大陆留学生是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中比较特殊的一群。他们自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中国政府放宽中国公民出国留学时起就源源不断地流向澳大利亚，但被澳政府人为地切割为两个阶段：1989年6月20日前到澳者为前一阶段；此后为后一阶段。据移民局统计，到90年代中期，约有5万多名中国大陆人持留学签证赴澳。他们中，1989年6月20日以前抵澳者约25000人。^[9]这5万人中有相当部分通过各种途径取得澳当地居留证乃至成为永久居民、澳国公民。因而，中国大陆新移民中的“原留学生”是相当可观的一群。现今，他们中有半数以上已从大专院校毕业，有的还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凡学有所长者，均挟一技之长进入工程技术、医疗卫生、高等教育和文化艺术界任职。他们兼通中澳文化，串联东西桥梁，有创业之大志，又不乏脚踏实地精神，为政府、学术界及社会其他各界所器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文化适应，他们会融入当地，置业创业，在澳洲不同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华人星空中耀眼的一群。

从中国留学生的来源地看，以上海最多，占33.6%，其次为北京，占18.3%，再次为广东、福建、分别占17.9%和9.3%。从其在澳大利亚的居留地（州）分，澳政府教育部各大学注册表统计表明，以新南威尔士最多，约2万人（主要集中在悉尼），维多利亚1万人（多集中在墨尔本）；首都堪培拉和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共1万多人，其他地区总共不超过2000人。他们中初学英语或学商科的约占90%。^[10]

1992年11月，西悉尼大学人文科学院冯兆基教授、格里菲斯大学亚洲和国际研究院刘西安博士和南昆士兰大学艺术学院江建新博士以及1993年民族学校委员会、澳华基金会和中国留学生联合会等16家团体于8月29日和10月30日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一些分项统计可大略反映

出中国在澳留学生的侧影。如，他们原先的文化程度多为大学本科以上（占 42.5%，其中硕士研究生占 20.6%），说明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他们的职业以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分别占 27% 和 25.5%）为多，达一半以上，可以说是未来中产阶级的稳定来源；他们具高级职称者占 4.2%，其中级职称者占一半（49.8%），且来澳前高达 69.8% 的人已有 5 年以上的工作经历，21.6% 的人已工作 2 - 4 年，反映了他们人生历练的相对成熟，工作经历的相对丰富，应是人生创业的较好季节；他们中 85.4% 为自费，其中靠亲友资助者占 41.4%，靠借贷者占 18.3%。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来澳后一年左右都已还清所欠钱款。这反映了他们自我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均极强，社会适应能力也较强，是不可小觑的一群。另外，他们中已婚者达 51.7%，其中有子女者占 40.1%，未婚者占 44.2%，已订婚者占 7.5%，离婚者为 4.1%。因之，他们将来可以通过家庭团聚为澳华社会再带来一群新移民。^[11]

二 移民就业概况及对中国移民就业情况刍析

无论是何国移民，人们最关心的头号问题无疑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就业情况。那么，过去十多年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外来移民包括中国新移民的就业情况如何？表二显示了近年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移民的失业情况。由于找不到更多的数据作为佐证，且没有移民类别（经济移民或社会移民）的区分。所以，以下的分析只能说明一些宏观的问题。

无疑，总体而言，移民失业率之高是十分惊人的。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新西兰，都高达 30% 以上。假设一个国家的总劳动人口达到这个失业率，则很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好在这还只是这两个国家一部分劳动人口（且是十分特殊的劳动人口——新移民，他们的总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很低）的失业率，问题就不致于那么严重。

但设身处地地站在新移民的角度来看，39%（澳）和 35%（新）的高失业率就绝非耸人听闻了。这意味着外来移民中（应注意，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两国政府着意吸纳的总体素质高于本国公民的技术移民），每三个人中至少有一个在他们的新故乡找不到工作。这对他们的心理会造成什么伤害？对接踵而来的新移民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理解，毕竟这群“新客”初到陌生之地，无论从环境适应到社会心理适应均需一个过程，作为移民，一般都有较常人优胜的心理素质，“淘金梦”固然令人憧憬，但一旦梦幻破灭重新直面现实时亦会很快完成心理转变过程。因此，在移民一族中，即使有如此高的失业率，并未见有太大的冲击。

尚不清楚表二是否包括对中国移民的统计，但若对性别、年龄和来源地的失业率加以分析，仍可以解读到一些有意义的信息。笔者以为这些信息对于解读华人移民的情况也是适用的。首先，从性别来看，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都是女性的失业率高於男性。从常理来看，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女性更多地是以“家属”的面目出现。（如果从类别来看，则多属家庭团聚类型移民），找工作（特别是找技术性工作）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但从澳、新两国的个案来看，女性与男性的失业率差别并不算太大（澳大利亚为 3%，新西兰为 4%）。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来的女性移民有较强的自立能力和适应能力，不少女性有与男性不相上下的技能。况且，一些就业岗位是男性替代不了的，非女性莫属。

其次，从年龄来看，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有很大不同：澳大利亚是年龄段越高，失业率越高。年龄高低与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而新西兰则是 15 - 24 岁与 25 - 34 岁年龄段的失业率呈上升状态，35 - 44 岁与 45 - 54 岁年龄段的失业率在上升中持平，而 55 - 64 岁的失业率大大下降。各个年龄段的失业曲线呈明显的 U 型走向。这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移民的技术素质相关：新西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社会保留着较多的适应年龄较大的人的工作岗位，也即年长者一般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接受新信息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在经济发展程度尚不高的新西兰更易于找到

工作。澳大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是否如此，可以继续探讨。

最后，从移民来源地区来看，在澳大利亚，失业率最高的首先是来自东南亚的移民，其次是来自南亚的移民，最低的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在新西兰，失业率排前列的分别是南亚、东北亚、东南亚的移民，而最低的是来自大洋洲（实即澳大利亚）、欧洲的移民。显然，从移民来源地区来看，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来自亚洲的移民比来自欧洲的移民失业率高得多。这种现象可以找到许多原因来解释。但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亚洲移民的英语水平比欧洲移民差，因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纯英语社会中难以找到工作。当然，一国移民说本国语言也并非不可谋生。例如，说汉语或中国地方方言的人也可能找到一份收入较低的工作（主要在华人社会中），但机率就低得多了。在性别、年龄、来源地区三大就业因素中，来源地区起着主要作用。而英语水平的高低则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对于华人来说，语言有两大功用。其一是谋生、交际（包括以谋生为目的的交际）；其二是文化认同（包括家庭、社区、族群等社会单位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对于将文化认同看得很重的华人来说，语言永远是确定民族特征的重要因素。作为谋生用的华语只能在小部分华人的狭窄商业圈中使用。要在华洋杂处的广泛的商业圈中谋生，只能使用大家都懂的英语。由于纯粹使用华语的华人商业圈很小（华人商业圈通常也是华语、英语兼用），且商业层次低，容纳不了多少迫切要求找工作的华人，故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华人（尤其是新移民）的英语程度高低便与他的就业机会直接挂钩。

据分析，在移居澳大利亚的华裔中，英语水平各异。一项于 1986 年进行的调查表明，英语水平最佳者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学生移民，其“精通”英语者达 90% 以上；稍逊者为印尼华裔移民，因为他们就学率高，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故“精通”英语者达 80% 以上。中国移民的英语水平很低，略知或完全不懂的超过 55%。来自柬埔寨、东帝汶等地的华裔难民对英语略知一二或完全不懂的占 40% 以上。^[12] 另一项统计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1986 年的人口资料统计表明，华人英语水平在“好”或“很好”以上者已占其总人数的 69.8%。但这只是的总体估算。同年的人口统计资料还表明，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来的华人中，大部分都保留在家中讲汉语的习惯。以华人家庭中 5 岁（含）以上的成员为例，来自中国大陆的讲汉语者占 72.4%，讲英语者只占 10.5%，讲英语者的比例比来自台湾、香港者都低。台湾移民讲汉语与英语的比例分别为 78.8% 和 12.1%；香港移民讲汉语与讲英语的比例分别为 81.9% 和 15.5%。^[13] 1991 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则表明：来自 5 个新移民来源地（马、新、中国大陆、港、台）的华人中，讲粤语者为 165 283 人，讲普通话者为 55 454 人，讲其他方言者为 44 761 人，共 26.5 万多。其余则为讲英语者。^[14] 显然，讲英语者仍占少数。当然，

表二 近年澳、新移民失业率分类统计

分类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按性别	女性	0.41	0.37
	男性	0.38	0.33
年龄	15 - 24	0.43	0.29
	25 - 34	0.34	0.33
	35 - 44	0.40	0.40
	45 - 54	0.60	0.40
	55 - 64	0.68	0.29
来源地区	大洋洲	0.39	0.21
	欧洲	0.27	0.27
	东南亚	0.54	0.33
	东北亚	0.26	0.42
	南亚	0.50	0.59
合计		0.39	0.35

* 大洋洲在澳大利亚一栏中不包括新西兰公民，但在新西兰一栏中包括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人。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数据据 Williams, L. S., C. Brooks and J. Murphy, *The Initial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Immigrants*, Australian Bulletin of Labor, 1997. Table 1. 4. 表中结果是以“Longitudinal Survey of Immigrants to Australia” (LSIA) 为基础的。其第一轮采访于 1994 年开始，1995 年结束。其间对主要申请永久居留签证者以及 1993 年 9 月至 1995 年 8 月间到达澳大利亚的总数 5192 名移民进行了为期 3 到 6 个月的采访。新西兰数据则据 Winkelmann, L. and R. Winkelmann, “Immigrants in the New Zealand Labor Market: A Study of Their Labor Market Outcomes”, Wellington, Zealand Department of Labour, 1998. 详参 R. Winkelmann 上揭书，第 16 页。

上列统计中不讲英语的人中肯定有“粗通”、“略识”英语者，但要像纯讲英语者那样找到合意的工作，难度肯定大得多，失业的机率也高许多。

英语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移民的就业，还直接影响到移民的收入和地位。新、马、印尼华裔移民可能找到“白领”工作，大多数中国与柬埔寨、东帝汶华裔移民只能干“蓝领”的活。^[15]当然，80年代后期后移居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因学生移民与商业移民的增加而使其英语总体水平乃至整体素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这一一下子改变不了中国移民英语水平不高的基本事实，因而一下子也改变不了中国移民中“蓝领”较多的情形。

应指出的是，华裔女性的英语水平一般比男性更差，而尤以来自中国、柬埔寨、东帝汶的华裔女性最差。她们绝大多数是以“家庭团聚”的名义移入的，与新、马、印尼的华裔女性不同（后者大多数是“经济移民”）。一般来说，澳移民当局在审查移民资格时，对“经济移民”的英语水平较为重视，而对“家庭团聚”与难民类移民的英语水平则不那么看重。

直接影响移民就业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技能高低。据1986年的调查资料，中国移民普遍缺乏就业技能，生活环境暂不适应。中国移民这种状况与从柬埔寨、东帝汶等地迁入的华裔移民差不多，与新、马华裔“学生”移民的低失业率形成鲜明对照（新马“学生”移民的失业率比澳大利亚全国的失业率还低）。^[16]以职业地位而言，1986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就业的中国移民中，有2/3是工薪阶层；自我雇用者有1/8；还有19%属于“雇主”。在男性中国移民中，有很多是属于“手艺人”类别的餐馆厨师。以就业部门而言，中国移民在农业部门就业最多，另在娱乐与私人服务部门就业最多的也是中国移民。^[17]当然，上述数字很难简单地被认为是反映了社会职业地位的高低，也有社会分工、职业习惯与兴趣的反映。从工薪阶层来看，印尼、新、马华裔移民达80%以上，柬埔寨、东帝汶华裔移民约达90%，很难与中国移民分出优劣；与中国移民自雇率（1/8）相比，柬埔寨、东帝汶华裔移民自雇率只有约1/20；与中国移民的“雇主率”（19%）相比，柬、东帝汶华裔移民的“雇主率”不到5%，新、马华裔也只有9%。中国移民中自雇率与“雇主率”所以高达约1/3，主要原因是他们移居的时间更长，人数更多，大部分为“家庭团聚类”移民。若就亚裔移民内部进行比较，华裔移民的整体职业地位还是很不错的，他们除低于日裔移民外，高于其他亚裔移民，并高于澳大利亚全国就业人口。^[18]

职业的高低一般地与受教育程度挂钩，应该可以肯定。以白领阶层而言，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华人中，担任经理、专业工作和技术人员（或跨专业）的高达50.9%，显然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之故；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中，从事上述三大专业的占30.8%；在海外出生的华人中，则占27.3%；在越南出生的华人中，只占9.7%。而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中，从事上述三大专业的占29.7%，^[19]处于马、澳出生的华人与海外、越南出生的华人之间。从职业分布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马来西亚出生的华人在专业职务方面居首位，为30.5%；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职员最多，为18.1%；海外出生的华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为17.3%，从事劳工以及相关职业的占17.7%。越南出生的华人多为劳工或与劳工相关的职业，占34.7%；而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所占比例最高，为24.7%。^[20]从收入来看，年收入在3.2万澳元以上者，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出生的华人占7%，香港出生的华人占6.4%，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占4.3%，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则占了4.6%。^[21]没有看到来自越南、柬埔寨和东帝汶等地出生的华人高收入的数据，相信其高收入比例应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之下。这样的话，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中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在所有华人中处于中等位置。

应该说明的是，就业率总体上可以反映居民的技术水平，但并非绝对地说明问题。除了技术水平的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类别的因素，也许更重要的还有居民就业适应能力和本人就业意愿的因素。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生的华人，就业率低于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而当地出生的华人的就业率则低于出生于越南和东帝汶两个华人社区的难民。香港和新加坡

出生的、具有劳动能力的华人，其就业率也高于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主要是因为这两地出生的女性华人就业率很高）。这样看来，中国大陆、台湾出生的华人的就业率比其他所有华人的就业率都低。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生的华人的技术水平总体上应高于柬埔寨、东帝汶出生的华人，当地出生的华人技术水平也应高于柬埔寨、东帝汶出生的华人，而中国大陆、台湾出生的华人的技术水平也不应低于当地出生的华人，但为何中国大陆、台湾出生的华人就业率独低？这说明就业岗位类别、就业适应能力、就业意愿等因素在起重要作用。例如，柬埔寨、东帝汶出生的华人多为难民，或有“难民气质”，对就业岗位、工薪高低不加选择，更加吃苦耐劳；当地出生之华人更熟悉当地社会，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等等。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人对就业岗位、工薪高低的考虑更多一些，法制陌生，又没有建立起社会网络，就业率低就不难理解了。

显而易见，就在新环境下的就业适应能力而言，中国大陆新移民并不居上位。但是，1997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华人新移民学者高佳对澳大利亚100多名1990年以前抵澳的中国大陆新移民进行定期访问时发现，这批抵澳7年以上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有61%以上的家庭已购置了自己的住房。在未购置住房的家庭中，55%以上有了自己的产业。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高达82%的拥有住房或商业的家庭中，又有32%事实上已购置或正准备购置除个人住房或商业以外的投资房或其他形式的投资。^[22]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在于，从澳大利亚人的角度看，中国新移民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其个人住房及商业投资拥有率高达82%！因为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拥有私人住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人的梦就是购置一套有前后花园的住宅。这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综合生活质量高低的一项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而这群八九年以前才中断了在中国的学习和工作，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短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澳洲人梦想，不能不令人惊叹，也值得世人深思！

在高佳的调查中，有多项因素对这批新移民在澳大利亚创业不利：其一，他们到澳时年龄普遍偏高。他们在1990年时的平均年龄已达35岁“高龄”（就就业最佳年龄来说），最大者竟达47岁，最年轻的也有31岁。这说明，新移民从年龄上讲，其家庭积累过程已经开始得很晚，在劳动力市场上已不可能象20几岁的小伙子那样有利；其二，英语水平不高。高佳的调查表明，80个以语言生身份来澳者中只有5人的英语在初到澳时达到中高级班水平。绝大多数语言生（67人）刚来时的英语为初级班水平，另有8人自称“比初级班稍好”。据澳移民部1990年公布的数字，语言生占中国大陆来澳学生的90%左右，因此，高佳调查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澳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这与上面有关中国移民英语水平的分析是一致的。其三，他们来澳时所带资金有限。80年代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低，这批新移民不可能携带大量资金出国创业。在高佳访问的以语言生身份来澳的80人中，除所交学费中包括了3到6个月的生活费外，80人中多数人只带有300至500美元，只有11人带500到1000美元，4人称带有1000多美元。也就是说，这批新移民后来的积累完全是靠他们自己在澳洲当地赚得的，而不是从中国带来的。不仅如此，80名语言生中有76人称有偿还“出国债”的负担（出国债数额在5000美元以上）。^[23]面对这样的窘境，这批新移民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初级家庭原始积累的过程？高佳的研究概括了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在赴澳的初期和中期不惜一切代价就业，白手起家。他们可以说没有任何就业优势，唯一的优势就是吃苦耐劳。他们来澳伊始马上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熟人”或看报纸、打电话等）找工，倘若丢工（被炒鱿鱼等）旋即再找，决不守株待兔。不论岗位高低，工薪多少，路途远近，工作早晚，对口不对口，也无论如何先有一份工作，然后再“骑马找马”，保证每周有收入，不能坐吃山空。尽管不少人在国内时干的是白领工作，但到澳后都得放下身段，从底层做起，大多数人干过洗碗、打扫卫生等工作，不少人初到时有沿街敲门求工的经历。

其二，多种工作，加快积累。不少人都打过两份甚至两份以上的短工，最常见的兼打短工方

式是几个人在一起分担一份洗碗工或清洁工。慢慢地，才得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全职工。

其三，走自我就业之路。自我就业的原因一方面是一部分人经历多种工作后有所选择的结果，一方面是上述诸种不利因素（年龄偏大、语言隔阂等）以及种族歧视（尤其是就业及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因素“逼迫”的结果。自我就业者多从事小商业（小店铺、小生产厂家及各种小规模服务设施等），尤其是餐饮业或与之有关的小商业。当然，自我就业的一个有利条件是享受税收的优惠。澳洲为高税收的福利国家，因之，政府鼓励从事小本经营以扩大就业市场。

其四，关注市场走向。这包含三重意义，一是把握致富机遇，二是选择对中国移民合适的工作而非到当地人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去凑热闹，三是必要时改变经营方式。^[24]

其实，中国大陆新移民上述经验也是很多人站稳脚跟、逐步积累致富、成为中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从最初的不惜一切代价就业，到稍后的多重就业，后来转入自我就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其中自我就业是一个关键环节。它往往需要每一个有一定资金积累的新移民在十字路口上作缜密考虑。在澳大利亚，市场经济已高度成熟，小商业企业是健全、开放、规范化、制度化的。大量的小商业企业不断上市，只要人们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贷款能力，或熟悉某一行业，便可购置一个进行自我经营。经营者在经营一段时间后亦可将所置产业上市出售，由购买、经营到出手，小本经营形成了一个完善又开放的庞大市场。这一市场是澳洲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不可替代性确保了自我就业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就这样，这批留学生站稳了脚跟，再求发展，逐渐积累，工作性质、条件、收入也逐渐得到改善。几年后终于摆脱了窘境，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达到了小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批留学生赴澳之初，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祸不单行，其时正值澳洲碰上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但他们以常人难有的意志，忍受住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终于挺过来了。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 [1] [2] Rainer Winkelmann,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Se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rends, Policies and Economic Impact" (edited by Slobodan Djelic), p. 6,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 [3] [4] [5] *ibid*, p. 7.
- [6] [12] [15] [16] [17] [18] [澳] 詹姆斯·考夫兰, 饶志明. 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社会剖析 [J]. 八桂侨史, 1994, 3. 50, 52, 53.
- [7] [澳] 戈登·福斯. 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8. [澳] 詹姆斯·考夫兰. 澳大利亚华人社会概观 [C]. 台湾. 海外华人研究, 1992, 2. 199. 张秋生. 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现状与前途 [J]. 世界历史, 2000, 5. 38.
- [8] 黄润龙, 鲍思顿, 刘凌. 近十年我国大陆海外新移民 [J]. 人口与经济, 1998, 1. 21.
- [9] [10] 杨力. 澳洲华人新移民的崛起 [J]. 福建论坛, 1996, 4. 49.
- [11] 澳大利亚人报 [英文] [N], 1993, 6. 11. 杨力. 澳洲华人新移民的崛起 [J]. 福建论坛, 1996, 4. 49.
- [13] [21] [澳] 何朝洪, 纪宝坤. 澳大利亚华人概况 [A]. 澳洲华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Z], 莫什那大学, 1988. 19, 39. 张秋生. 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现状与前途 [J]. 世界历史, 2000, 5. 38.
- [14] 华侨经济年鉴 [Z] [台湾], 1993. 782.
- [19] [20] [澳] 纪宝坤, 王福贵. 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经济结构剖析 [J]. 民族译丛, 1990, 1.
- [22] [23] [24] 高佳. 澳大利亚中国大陆新移民家庭积累的方式及过程 [J]. 人口与经济. 1999, 3. 47. 48 - 51.